

劉光義著

莊學中的禪趣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劉光義著

莊學中的禪趣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二月初版

莊學中的禪趣 一冊

基本定價二元二角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劉光義

發行人

朱建民

印刷及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臺北市10036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電話：(〇二)三一六一一八
傳真：(〇二)三七一〇二七四

校對人：黃伯勤 趙麗君

自序

莊子生於戰國之世，面對世亂，以一書生，抗無力，逃無所，避無方，任此身所遭所遇，而不以之置臆擾懷，知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而提昇其精神，悠遊於宇宙自然。以身則有生必死，死生自然，一氣之化，人之所不得與也。佛本即感於生老病死，人所必經皆歷，而無所免，歸諸地水風火，四大皆空，而為開脫。兩者似皆以人生多苦，衰世產物，其形上思維，有其相通者也，惟佛淨土宗而後，強調西方極樂世界，莊則言：「上與造物者遊」，「出乎六合之外」，「與寥天為一」。淨土於信奉者言，似實有其處；而寥天何在？殆言身與道合，歸諸自然耳。二者同為超越，一為哲學，一為宗教，其因殆在此也。莊佛所持宇宙論，同為虛空則無別。

殆亦因是，莊佛二者有其結合溝通之管道。近人吳經熊氏說：「大乘佛學的推動，使老莊的透澈見解，在禪的方式上獲得了復興和發展。」西哲湯姆士默燈（Thomas Merton）亦言：「唐代的禪師，纔是真正繼承了莊子思想的人。」湯姆士已確切的說到了莊與禪的關

係上。禪學者日人鈴木大拙更具體的說明：「禪師的最明顯的特質，是在於強調內心的自證。這種自證，和莊子的坐忘、心齋和朝徹是如出一轍的。」如此，爲拓展莊學領域，必延伸於禪學，此斯帙所以撰寫原因之一也。

又吾國自清道光而後，西人挾其優勢利器，迫我洞開門戶，盡撤藩籬，固有的文明，社會的秩序，均爲摧毀殆盡。而西方文明者，今儒錢穆氏稱之爲「手段文化，或工具文化。」又曰：「一切人生作爲，皆屬手段；一切物質建設，亦盡工具。」錢氏之言，是否適宜，不敢妄施月旦。愚意西方文明，自亦有其價值；惟近百年來，我國勢積弱，自庚子八國聯軍入侵一役之後，國人尊嚴盡失，以崇洋媚外爲維新，以趨附西方生活方式爲進步；而真正西方文明則了無所得，亦了無所知，所見者唯西方物質生活，而亦以此爲一國上下全心全力追求之目標。迨大陸盡棄，播遷來臺，以蕞爾一島，養育千萬爲積之生民，必作物質豐隆之追求，無以處生計而渡艱辛，卅年以來，遂成就衆口交騰，舉世艷稱之經濟奇蹟。國爲勢迫，既成此象，上行下效，人人亦惟利得享受是務，精神文明，道德倫理，全然棄置不顧。雖經濟上已有豐碩創建，而社會國人，并未蒙受福祐；人欲橫流，暴戾日熾，環境卑污，秩序大壞，置身其間，迄無寧日，昔之樂土，將淪「鬼域」矣！其僅知物質享受，而未識西方真正文明，又全棄故有文化之故也。鈴木大拙博士於其禪學隨筆一書中言曰：「大部分的人，特別

是在工商社會的今日，如此易於興奮衝動，以致常常過早的耗盡了他們的精力，最後終致喪失心靈的平衡。」

莊生生於戰國時期，而亦有類似言論。齊物論篇之言曰：「與接爲構，日以心鬥，縵者害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戰國大亂，人之心態如此，甚可悲亦可卑。而今日人心鄙劣，當尤大過之。面對如此人生，鈴木大拙繼謂：「禪一方面挽救精力這種無益的浪費；一方面可以說儲蓄精力。」而莊子之哲理，則欲消融已入歧途之人文界，而納諸自然界，以道家術語言之，抱璞返真，重歸自然合諧也。莊禪哲理，殆皆在於沖淡人欲，恢復人性中之恬靜虛淨也。可使吾人面對的現實，尤於臺灣人爲之混亂，物欲之大患，漸趨淡泊，卒歸寧靜，重現天賦之智慧，勿辜生而爲人之意義，此又斯帙所撰之另一義也。惟愚駭如筆者，難臻圖潤精當之地耳。

此秩撰寫之際，侍宗方讀東海史研所，最新材料，多伊所助；美華則甫自巴黎第一大學歸來，方撰寫其博士論文，常伴我於中央圖書館，亦多得其佐助；麗敏方遠嫁異邦，行前亦爲我蒐輯材料不少；而時於督促鼓舞者則瑤璋也，一并掬誠致謝。

此帙撰寫既畢，兒子雨生偕妻率子，自美來歸省余，父子天親，愉悅倍增，伊母尤爲欣慰。且雨生耕生兄弟久別重逢，各携其子思源及思沛思瀚相晤，世亂粟六，骨肉聚首，洵足樂也。爰爲之記。

目錄

自序	六
一、緒論	八
(一) 中印兩民族間思想及意識形態的懸隔	一
(二) 印度佛法的中國化	四
(三) 中印思想於佛法上的形上結合	一
(四) 中國禪的始祖和六祖	二
(五) 禪與中國文化	三
二、分論	四
(一) 莊禪論道	四
(二) 櫻寧與禪定	五
(三) 暖暖內含光	六

四、統合與不二	七六
五、喪我與真我	九四
六、見獨開悟與頓漸	一〇五
七、本性佛性	一一七
八、莊與禪的生死觀念	一二四
九、莊與禪的無爲齊物觀	一三五
十、無待、不染	一四二
十一、莊禪與語言文字	一五八
三、莊論	一七九
四、結論	一八六
五、附錄	一九〇
(一) 佛道相通相同的形上關係	一九〇
(二) 宇宙浩渺一莊周	二一六

一、緒論

(一) 中印兩民族間思想及意識形態的懸隔

中國和印度兩大民族，各據有幅員廣大的土地，均有古文化燦麗精湛的留傳，雖有着這樣偉大的相同；但於形上的思想和意識形態的趨求上說，却有天地的懸隔，南轅北轍式的歧異。因此各有着他們的發展空間及分野。中國人是屬於一個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民族，而印度人則是一種富於幻想冥思的民族。日本人鈴木大拙說：「中國人不像印度人，不喜歡葬身於神密的超自然雲霧之中，莊子和列子是古代中國最接近印度型心靈的人物；但……不類印度的大乘學者，莊子頂多也只是騎在『其翼若垂天之雲』的大鵬背上乘虛遨遊而已，而列子亦只是命令風雲作他御者罷了。……中國人是澈底的崇尚實際的民族。」（註一）印度的文化氣氛，實在是過分玄虛的。實際上是過分的縱情於神秘的想像中。中國學者錢穆先生也說：「佛教本是一種出世法，而中國文化傳統，尤其儒家思想，徹頭徹尾，乃是一種人文本

位之在世法，兩者終難融恰。」（註二）於此，吾人當追索兩者所以殊異分歧的原因和道理。近人劉師培曾有一段話，可以資助吾人做爲說明。他說：「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其間多尙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地，多尙虛無。」（註三）這自然是說：因爲地理因素的不同，造成的意識形態和思想表達的殊異。同處中國疆域之中，而只南北之殊，尙且如此！何況中印兩國，有太多的地理因素不同，於此造成的懸殊，當不啻於千百倍。錢穆氏說：「印度地處熱帶，物產豐盈，摘林果便可飽腹，披單衲便可暖身，生事易給，而釋迦牟尼，乃從人之生老病死起念，深切感到人生無常，教人以出家乞食，來體悟他的空虛本無的無上真理。」（註四）此錢氏說印度思想產生的地理氣候因素。

中華民族發生繁衍，在中國西北的黃河流域，天寒地燥，土瘠物貧，生事惟艱，即辛勤工作，亦難獲溫飽。衣食之來，全靠努力耕耘，辛勤勞作，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在詩經裏多有此種記載：幽風七月；周頌噍嘻、載芟、良耜……等詩篇說的更爲具體，有着此種環境的真實，故能產生這樣的詩篇。詩篇既是生活現實的反映，長久生活的現實，自然鍛煉搏育出相應的思想及意識形態。中國的哲學思想，最早的儒道兩家。影響中國人性格思想最深最廣的是儒家哲學；儒家哲學以孔子爲中心人物。在孔子的思想裏，充分的反映着，這種務實崇真的思想。例如論語一書，即多所有之。如說：「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孔子的弟

子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治長），朱熹集注說：「文章德之見於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孔子當是不願談這些玄遠幽深的道理；不但自己不願談說，也不願自己的弟子討論這些，所以當弟子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所以對弟子樊遲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雍也）。朱熹注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所以孔子教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他的學生所學所得，全是務本之學。弟子有若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學而）。把形而上的道，也建立在形下的事具形見方面。這不全是儒家腳踏實地的證明嗎？孔子還有幾句，關於這一方面意義深長的話，他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朱熹注引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這不更是務實的徵兆嗎？孔子學說，影響也規範了中國人民生活二千餘年，無論你願或不願，都承受到了他的薰陶，自然形成了中國民族性的因素；且是不可輕忽的部分。中國重要的文化既如此，而佛來中土，當兩漢之交，此一時期的中國大思想家，其心態又如何呢？揚雄是西漢末的學者，他力斥神仙生死之說的不當，所以他說：「神怪茫茫，若有若亡，聖人曼云」（註五）又說：「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

也。忠君孝子惶乎不惶……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自然之道也。」（註六）稍晚於揚雄的桓譚，於其上光武皇帝疏說：「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之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可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另一個崇拜揚雄和桓譚；并以桓譚擬聖人的人是王充。他作論衡一書的動機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註七〕他又說：「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虛妄顯於眞，實誠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輳，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是轉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註八〕此即佛蒞中土，他所面臨的文化環境。在中印民族性格思想如此扞格難溶的情形下，佛法如何能移植中國？鈴木大拙就曾說：「我要說中國人是腳踏實地的；傑出的腳踏實地的，這與印度人的心智不同。因爲印度人喜歡玄思，傾向於抽象超世和非歷史性的心智。當佛教僧侶初來中國，中國人反對他們的不工作，以及獨身狀態」。〔註九〕中印兩族的民族性，眞有天壤般的懸隔了。

（二）印度佛法的中國化

如此說來，佛法來中土生根滋長，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歷史的事實證明，佛法不但已入

中土，且發華壯大奇蹟式的，彰彰在世人的眼前；但這不是偶然的，中印思想的相互接合溶入，有其時代的因素，形上形下的淵源。這須作番清晰肯定的敘述。

佛法，在中印兩民族間，思想扞格不入的情形下進入中國，必須尋一依附或者說爲附着點，先存在下來，乃必要手段；事實上也是如此作了。佛法初來中國，於此吾人亦依一般說法，是在東漢明帝永平中。永平中有一段史實，讓我們方便的引來，作爲佛依道傳的證明吧！明帝永平八年（西元六五），詔令天下可以納縑贖死罪。他的兄弟楚王英，因此交納了三十四匹縑，預贖死罪。明帝下詔答楚王此一行措說：

「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註一〇）

後漢書楚王英傳也說：

楚王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

「浮屠」是佛陀的異譯。「伊蒲塞」即優婆塞，涅槃經譯爲「歸依佛者」，「桑門」即「沙門」，指出家修道的僧人言。這是佛附道傳的確切證明了。後漢書襄楷傳桓帝延熹九年（西元一六六）載襄楷上書說：

「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此道清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

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

裏楷這段話，不獨可以看出佛道并傳；且把「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看作佛道共同的內含，籠統不分，一而視之。佛初附道以傳，必有其因，不是偶然巧合的了。

四十二章經，是東漢時期傳入的一部經，是早期傳入中土的經卷之一。由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人翻譯，爲佛經漢譯之始。在這部經裏，有些話和黃老道家之言相似：如第一章言，「阿羅漢者能飛行變化，曠劫壽命，住動天地。」三十五章說：「學道之人，去心垢染，行即清淨矣。」又佛法的小乘，有和中國黃老神仙的呼吸吐納相類者。這些當是佛依道傳的原因了。其實更重要的是，佛初入華夏，所講的道理，不外「靈魂不死」，「因果報應」之類。袁宏的後漢記說：「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故所貴行善修道，以煉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爲，而得爲佛也。」藉這些話，佛在東漢所講主要的內容是：「靈魂不死」，是「福善禍淫」。事實上這些思想，全是中國所固有。詩、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朱熹集傳說：「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中國殷周時期，以父祖既死，仍可左右人間及子孫的禍福，爲最早的宗教

式的信仰，乃靈魂不死說的流布。至於福善禍淫，周易中亦有顯明的立說。坤卦文言，即言之鑿鑿的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自然這全是中國固有思想。中國思想是多方面的，何佛獨依道傳？佛固與道二者間有其相通處。

兩漢思想，可以說是「祠祀求仙，長生久視」的大結合大流行時期，所以然呢？後漢書方術傳的話，可以作為說明：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

孝武、王莽、光武，全是權力頂尖的皇帝人物，全爲了奪取保有政權，而處心積慮的圖謀趨吉避凶。方士者流，投其所好，競逐表現，遂形成了一種務實崇真以外的方術大雜燴。可惜的是把倡清靜無爲的道家，也拖下了水，混爲一談。在中國儒道是個并行共存的局面。因爲西漢董仲舒倡行的災異學，王莽所信的符命，光武所信的讖緯，全是儒學的歪曲墮落，自西漢末東漢初的揚雄桓譚王充，以至張衡仲長統這些大儒出，漸漸對這些歪曲墮落，作了批判；而儒學由這些歪曲墮落，漸走下坡。錢穆就曾說：「兩漢時代莊老敵不過儒家，但魏晉以

後，莊老盛行，又佛教傳入，雙方意態，多有相通。」那是說，魏晉以後，儒家思想走了下坡路。儒家沒落，固與董仲舒輩歪曲儒學有關，也和揚雄桓譚王充，這些崇尚自然的思想家有關，重要的背景政治環境，更有着重大關係，現在就討論這些。

東漢由于皇帝短命，國祚屢絕，「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皇帝短命，幼君嗣位，太后稱制。這些手握政權的皇太后，非但不是雞皮鶴髮的老太婆，而實年輕貌美的新「文君」。爲了皇室尊嚴，彝倫攸序，這些皇太后，不能直接接觸大臣，必藉外戚宦官以治事。故東漢一代外戚宦官，多專擅跋扈。東漢自和帝而後，宦者鄭衆始而干政，下及桓靈，「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於爲伍，匹夫抗憤，處士橫議」，（註一一），國政大壞。

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自古即甚強烈，先秦諸子之作，類皆淑世濟人之哲理。西漢之災異學，雖涉迷信荒誕，而其意亦在限制人君之亂政虐民。兩漢之交的學者，多崇奉自然，兼以民智日開，知識分子關心國事，較諸前代，尤有過之；益以光武皇帝提倡氣節，潔身自好之士，不與卑污之輩，同流合污，而好批評政事，因有大學生三萬餘人，以其言論，形成清議，推崇擁戴李膺陳蕃杜根等人，而非議宦官，二者迅即對立，演爲衝突，此歷史上書生干政之始，黨錮之禍，因之以起，所謂三君者被戮，八俊八顧八厨之流，皆遭禁錮，天下清流名士一網打盡，萬民失望，因激起黃巾之亂。後漢書皇甫嵩傳記黃巾之亂說：